气候变化、跨国经营

与<<<<<<<

**本土纺织品
代工企业的
发展**

周海燕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气候变化、跨国经营与本土纺织品代工企业的发展 /
周海燕著 . —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80767-619-5

I. ①气… II. ①周… III. ①气候变化—影响—纺织
品—加工企业—企业发展—研究②跨国经营—影响—纺织
品—加工企业—企业发展—研究 IV. ①F4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2079 号

气候变化、跨国经营与本土纺织品代工企业的发展

著 者: 周海燕

责任编辑: 田 玫

装帧设计: 申 飞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133 (发行中心)

0351-4922085 (综合办)

E - m a i l: sxjfx@163.com

jingj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j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承 印 者: 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7-619-5

定 价: 42.00 元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周海燕，女，1972年生，浙江江山人，高级经济师。1993年毕业于郑州大学，长期从事纺织品贸易工作。2006年开始担任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开放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研究员，2009年入选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员。在《管理世界》、《亚太经济》等核心期刊及重要国际会议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了《后配额时代的中国纺织品贸易研究》（2007年）等学术专著2种；主持或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重要研究10余项；获得“全国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中国贸易救济与产业安全研究奖”、“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全国商业科技进步奖”等重要学术奖励10余项。

序言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国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制造业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0 年 2 月 2 日发表《中国经济调查报告（2010）》称，中国未来 5 至 7 年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品制造国。中国制造业外包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世界加工工厂”和“全球制造代工服务平台”。很多中国企业都采用没有拥有自己品牌的代工模式，仅仅是世界各大厂商的代工。因此，代工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一种主要经营方式，是中国企业融入国际生产制造体系及参与全球化国际竞争分工的重要途径。这种代工经营模式为中国企业带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那就是作为接受代工的中国企业仅具有对产业低技术部分的制造加工能力，自身缺乏产品设计和研发优势，缺乏技术创新能力，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信息来源和销售渠道严重依赖海外供应商和进口商。并且随着“超竞争”时代的来临，中国代工企业所处的市场和行业环境日趋复杂化、动态化与不确定，中国代工企业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其在稳态环境中建立的优势被不断侵蚀，在以往市场环境中形成的静态均衡不断被打破。同时，对于中国本土代工企业来说，国际制造业资本的直接投资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会带来本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业规模的扩大，如果本土代工企业能够与支柱企业形成产业配套关系，则不仅能在短期内得到发展，而且在配套中通过技术学习，能积累起动态的创新能力和获得长期竞争优势。但是，现实情况却是国际制造业资本只对原材料等配套设施感兴趣，不愿意提升本土代工企业动态适应环境的能力。

这种在劳动力低成本禀赋依赖、产业集群式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地方政府“政绩与晋升”锦标赛式的粗放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竞争机制以及收入不平等所造成的本土市场内需不足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现有国际贸易格局中，作为全球代工体系中发包方与主导方的发达国家国际大买家与跨国公司不断对作为代工接受方的中国本土代工企业能力提升进行限制和控制的背景下，中国本土众多代工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生存条件日益恶劣。特别是从美国肇始的金融风暴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严峻挑战，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代工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竞争生存压力。以纺织业为例，作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受益产业，尤其是从 2005 年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取消后，中国纺织品出口增长迅速，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代工中心地位更为牢固。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纺织产业虽然在数量和规模方面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其质量和层次的竞争优势并不强。中国纺织业以贴牌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整体上还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环节，国际竞争力不强，利润空间日趋缩小，迫切需要从 OEM（代工生产）向 ODM（自主设计）、OBM（经营自有品牌）转变。从纺织业的例子可以看到，中国代工企业如何适应动态变化的环境，如何生存、获得利润并持续发展，从 OEM 模式升级为拥有自主品牌的 OBM 模式，是理论界和实践中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此外，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制造业国家，通过研究代工企业融入国际制造网络这一科学问题的一般规律，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越南等）的代工企业提供借鉴，具有国际意义。

本人自 1993 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后，所从事的工作与纺织品跨国代工直接相关，在完成艰辛工作的过程中，思考良多。近年来，本人

围绕气候变化、跨国经营、本土代工纺织企业发展等相关问题陆续撰写了一些学术论文，这些论文有些发表在《管理世界》等学术期刊上，有些获得了省、部级学术奖励并引起了一些学术反响。但更多的论文还没有发表，此次一并结集出版。需要说明的是，书中部分内容是与他人合作完成的，发表、获奖与合作情况均在书中一一注明。未注明合作情况的均是本人独立完成。在近年来的研究中，本人得到了郭重庆院士、许庆瑞院士、吕政学部委员、姚先国教授、唐海燕教授、胡祖光教授、吴宏教授、程新章教授、谢洪明教授、殷德生教授、关涛副教授、倪宁副教授、朱怀意博士、焦豪博士、李凯博士等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嚶其鸣矣，求其友声。”由于本人学识有限，书中难免谬误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周海燕

完稿于杭州嘉翔园

2012年8月12日

目 录

第一章 论国际投资协议嬗变中的气候变化议题	1
第一节 国际投资协定需要有效地为发展服务	1
第二节 国际投资协定在吸引低碳外国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双刃剑作用 ..	3
第三节 发挥国际投资协定与气候变化政策之间的协同作用	5
第四节 进一步的思考	8
第二章 低碳外国投资的利弊分析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选择	9
第一节 低碳外国投资的重要性及发展趋势	9
第二节 低碳外国投资减少东道国 GHG 排放的途径	11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推动低碳外国投资发展的利弊分析	13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消除低碳外国投资消极影响的政策	16
第五节 进一步的思考	18
第三章 发展中国家吸引低碳外国投资的战略选择	19
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吸引低碳外国投资战略的重要性	19
第二节 以新商业机会为契机的发展中国家低碳发展政策	21
第三节 投资监管框架是吸引外国低碳投资的关键因素	23
第四节 投资促进机构在发展中国家吸引低碳外国投资过程中的作用 ..	25
第四章 抑制 GHG 排放、结构变革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27
第一节 GHG 排放及其对全球气候的影响	27
第二节 通过抑制 GHG 排放实现减缓气候变化的结构变革	30
第三节 抑制 GHG 排放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33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需要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政策框架的设计	39
第五章 异质性能源消耗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44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44
第二节 相关文献回顾与评述	45
第三节 理论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48
第四节 模型检验与实证分析	50
第五节 结论与政策含义	53
第六章 TRIPS 视角下的低碳技术跨国扩散	55
第一节 低碳技术扩散与知识产权保护的矛盾	55
第二节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对低碳技术扩散的政策争论	56
第三节 TRIPS 视角下低碳技术跨国扩散如何才能尽可能快地发生	59

第四节 进一步的思考	62
第七章 美国征收外资补偿标准的演进及其对国际投资规则的冲击	64
第一节 征收问题是国际投资法中的热点问题，牵动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神经	64
第二节 美国国内法中征收补偿标准的演变	66
第三节 美国对“充分补偿标准”的坚持	67
第四节 美国对充分补偿标准的细化与软化	68
第五节 美国征收外资补偿标准的演进对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影响	70
第八章 中国企业海外购并的尽职调查问题：山河智能购并 HPM 失败案例分析	73
第一节 前言	73
第二节 中国企业海外购并的风险构成	73
第三节 山河智能收购 HPM 案概况	75
第四节 山河智能收购过程中的尽职调查失误	76
第五节 结语	79
第九章 外商投资模式、技术转移以及市场结构的博弈关系	80
第一节 模型的基本假设	80
第二节 产品市场的均衡	81
第三节 技术转移水平的选择	82
第四节 外商企业所偏好的进入方式	83
第五节 结论与进一步的讨论	85
第十章 基于财产权分析的纺织业传统知识保护的博弈策略	86
第一节 传统知识产权是改善我国纺织业知识产权状况的可行路径	86
第二节 构建传统知识产权的理论架构	88
第三节 实现传统知识产权：以商业性法律规则为核心的制度建构	90
第四节 基于财产权的分析框架的典型应用：对我国纺织业传统知识保护的若干政策建议	94
第十一章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本土 OEM 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以服装业为例	100
第一节 引言	100
第二节 文献综述	102
第三节 本土 OEM 企业在全价值链中的定位分析	106
第四节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提升本土 OEM 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113
第五节 案例分析：GVC 视角下宁波服装代工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	123
第六节 结束语	129

第十二章 后配额时代纺织品贸易的知识产权壁垒及其对策	130
第一节 表征及其发展趋势	130
第二节 行业变革背景下的知识产权壁垒与我国纺织业自主创新	134
第三节 我国纺织业应对知识产权壁垒的主要途径	137
第十三章 论纺织行业反倾销自律活动中的垄断法律风险及其克服	142
第一节 我国纺织业出口自律回顾：绩效与风险	142
第二节 行业反倾销自律活动的垄断法律风险及其分析	146
第三节 纺织行业自律风险规制的法理思考和政策建言	152
第十四章 后哥本哈根时代中国纺织业的低碳发展策略研究	159
第一节 低碳发展模式已成为后哥本哈根时代中国纺织业的必由之路	159
第二节 低碳经济催生的新型绿色壁垒对我国纺织业提出严峻挑战 ..	161
第三节 我国纺织业低碳发展现状与面临的问题	164
第四节 我国纺织业应对低碳经济挑战的几点对策建议	166

第一章 论国际投资协议嬗变中的气候变化议题

第一节 国际投资协定需要有效地为发展服务

摘要：气候变化是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它直接关系到人类能否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因而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随着气候变化形势日益严峻，应对的呼声日益高涨，但要解决包括气候问题在内的环境问题、走出发展与减排的困境，必须要正确看待国际投资协定在吸引低碳外国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双刃剑作用，尽可能地发挥国际投资协定与气候变化政策之间的协同作用，从而实现国际投资协定对气候变化相关政策措施所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并使其消极影响最小化。

关键词：国际投资协定；气候变化；协同作用；政策协调

现行的国际投资体系是由国际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s）、避免双重征税协议（DTTs）以及其他双边和区域间与投资相关的协议（如自由贸易协定或者经济合作协定）等众多的国际投资协定（IIAs）所构成。国际投资协定制度的系统性发展正初具规模，潜在地为建立更加连贯、平衡和有效的国际投资制度创造了机会。有迹象表明，从整体来看，原本以大量重复并且有时矛盾的规则为特征的国际投资协定制度，正在朝更加集中和连贯的国际法机制方向发展。区域层面上制定投资法活动的增加，正在兴起的条约类型的简化，各国对其国际投资政策进行重新评估以加强投资政策对发展的贡献等，都是这种发展的表现。国际投资协定制度与关键的新兴全球政策之间的互动，及其自身同步发展的统一，最终可能为国际投资协定整体向前发展、形成

一个全球共享的观点作出贡献。在此背景下，可能会出现几个发展趋势，包括：①开始对国际投资协义务进行更加连贯和系统的解释（可能得益于在新标准 BIT 或者其他条约内容现代化公开声明中所提供的标准“软”法的帮助）；②对国际投资协定关键问题的共同理解有所发展；③制定更加协调和集中的方法来处理复杂问题；④加强国际投资协定和其他公共政策领域的互动。所有这些发展都大大有利于保证国际投资制度以一种更为有效和有利于增长、发展的方式发挥作用。尽管如此，使国际投资协定有效地为发展服务，仍然是一个挑战。

将全球气温降到更可以接受的水平而所需采取的大规模减少碳排放措施，需要全球采取行动，而且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应该作出主要努力，对于这一点，人们有着广泛的共识。发达国家应该对目前降低 GHG（温室效应气体）浓度的工作承担主要责任，因为其有更强的金融和技术能力来采取减少 GHG 的必要措施。尽管如此，对 GHG 排放增长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也不能只作被动的旁观者，必须主动采取应对措施，如若不然，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总量将会持续上升，有可能冲抵发达国家的减排努力，导致所谓的“碳泄露”。减缓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与对发达国家的意义一样重大，可以极大地促进他们发展及减少贫困，因此，发展中国家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与实现减少贫困目标的政策之间的联系达到意义平衡，对它们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争论，已经不再是关于是否应该采取行动的问题，现在所关注的是应该采取多少行动，以及需要采取什么行动、由谁采取。政策制定者需要使低碳外国投资的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但这并非易事，尤其考虑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该领域几乎没有经验。此外，国内推动低碳投资的战略和相关技术传播，应该与气候变化和国际投资政策协同一致，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金融资源和机构能

力来有效地实现这一点，因此，建立一个国际支持体系至关重要。为保证国际投资协定对减缓气候变化作出贡献，需要在未来的国际投资协定中引入环保规定，同时还需要一个多边备忘录来保证现有国际投资协定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和国内政策之间的一致性。

第二节 国际投资协定在吸引低碳外国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双刃剑作用

国际投资协定可以通过提供投资保护措施为政府吸引低碳外国直接投资的努力提供支持，但是必须注意这些协定的双刃剑性质。国际投资协定既可以成为鼓励低碳外国投资的刺激因素，也可以成为政府制定向低碳经济转型政策的障碍。作为外国投资的决定因素，国际投资协定会对公司在哪里投资的决策产生影响。尽管国际投资协定的签署与外国直接投资流动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一致的因果关系，但是由于国际投资协定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保护，因此对投资有着间接的促进影响。将保护与自由化承诺结合起来，以及将投资问题包含在广泛区域贸易背景下的投资协定，同时也会对外国直接投资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

尽管上述内容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外国直接投资，但是国际投资协定可能与吸引低碳外国投资有着特别的关联。在低碳外国投资使资本密集型部门具体化的范围内，国际投资协定在稳定法律制度方面发挥着相关作用。此外，较之其他部门，可再生能源或低碳活动的投资者更多地依靠刺激措施、政府提供支持和特定监管框架的承诺来建立企业。在加强投资者信心，使其相信这些有力框架或支持承诺能够持续存在并得以实施的范围内，国际投资协定会对公司的投资决定产生积极影响（Boute, 2009）。在这个背景下，投资者诉诸国际仲裁的重

要性就凸显出来。国际投资协定的这些特征（在稳定东道国法律、监管和政策方面的影响）也引起了一些顾虑。比较显著的是，国际投资协定会限制政府有关推动低碳经济转型措施的监管特权。更具体地说，有人担心，投资受到气候变化措施妨碍的投资者，可能会以违反一项国际投资协定规定为由，向东道国提起索赔（Johnson, 2009）。到2006年年底，已经统计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诉讼达255个。可能被认为对外国投资产生消极影响的气候变化相关政策范围很大，并且不同部门之间也有所不同。

国际仲裁是加强法律作用和保证法律稳定的重要手段，但还是有一些相互冲突的判例导致在阐释投资保护核心条款方面存在着不确定性。在加强或质疑气候变化相关政策时，下列国际投资协定规则值得特别注意：①征收。国际投资协定中有关直接或间接征收的规则，可以用来质疑降低特定投资经济价值的气候相关措施。在涉及环境监管的情况下，一些仲裁庭将注意力放在公共政策目的上（Methanex），其他仲裁庭则可能强调经济效应高于公共利益（Metalclad, Santa Elena），或者对金融影响与治安权原则进行比例评估（Tecmed）。②公正与公平待遇（FET）和最低待遇标准（MST）。国际投资协定有关FET和MST的规则往往被理解为是用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期望。如果政府拒绝提供预定的支持，废除市场创造机制或者强化生产程序排放标准，那么投资者可以利用这些义务来提出质疑。③保护伞条款。一些国际投资协定允许投资者以违反调整东道国与特定投资者之间关系的特别合同安排为基础，提起ISDS索赔。保护伞条款可以用来挑战政府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活动，这将涉及经济活动监管制度的变革，再加上ISDS案件发生的可能性必须在其适当的背景下进行审查，所以对投资者可能成功依赖ISDS的所有情形，或者投资者不能成功获

得索赔的所有情况，不可能作出全部预测。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商业运营、所质疑措施的类型、相关国际投资协定的语言以及处理该案件的仲裁庭构成。此外，ISDS 案件的结果越来越缺乏可预见性，进一步增加了该背景下的不确定性。

第三节 发挥国际投资协定与气候变化政策之间的协同作用

如果全球变暖不能减缓，那么其影响将主要作用于发展中国家。通常认为，主要由发达国家过去和现在排放的 GHG 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但是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尤其是其中最大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这种排放目前正处于急剧上升状态，除非采取有力行动，改变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否则这个态势将继续存在。2012 年后，发达国家的进一步深度减排是构建后京都气候机制的关键之一。发达国家的资金支持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后京都机制并有效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条件，所以发达国家需要通过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来领导减缓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这不仅是其自身利益所在，也出于道德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发达国家过去的行为造成了 GHG 的排放累积，对全球气候产生了影响，尤其考虑到发达国家拥有更强的经济、技术和管理能力，可以迅速向低碳经济转型，因此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根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参与全球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同样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所在，因为目前其 GHG 减排的趋势不是可持续的。气候变化是市场重大失灵的结果，政府需要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采取有力行动，减缓气候变化。目前，气候政策的国际框架仍然比较薄弱，如果得到加强，其许多内容都将有利于全球采取更为有效的 GHG 减排行动，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更大程度地参与。发达国家有道

德上的义务为发展和转型经济体努力减缓气候变化提供支持。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各方经过艰难的谈判和磋商，最终在会议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中发达国家承诺在 2010~2012 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 300 亿美元的“快速启动基金”，到 2020 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达到每年 1000 亿美元。

对实现国家气候变化政策与国际投资政策之间一致性的可能方法，各界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目的是加强国际投资协定对气候变化相关政策措施所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并使其消极影响最小化。在对美国标准 BIT 模式进行审查时，也提到了有关气候变化和未来国际投资协定的问题。

首先，需要增加国际投资协定与气候变化政策之间的机构联系和实际联系。承认国际投资协定在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背景下运作，将有利于国际投资协定为气候变化相关目标的实现作出贡献。相关选择包括：①允许（或要求）ISDS 仲裁庭指定专家报告有关气候变化的事实；②要求对未来国际投资协定协商进行气候变化影响方面的评估；③特别提及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律文件或政策工具。

其次，需要对国际投资协定能够提高气候变化相关积极效应进行管理。政策制定者可以对国际投资协定的语言进行设计，加强国际投资协定在帮助吸引低碳外国投资和鼓励相关技术扩散过程中的作用。相关选择包括：①序言，确认国际投资协定和相关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目的是帮助应对气候变化挑战；②制定“投资促进”规定，参考母国和东道国促进低碳投资的活动予以加强；③规定技术转让，特别是气候变化相关技术的转让；④规定“范围和定义”，以便适用于符合特定“气候友好型”标准的投资。

再次，需要为气候变化措施保留政策空间，包括对碳密集型投资者产生消极影响的监管变化空间和政策变化空间。处理国际投资协定的稳定功能与动态法律框架需求之间的矛盾，将是迈出的重要一步。相关选择包括：①气候变化特定例外；②对义务进行澄清，特别说明气候变化相关监管行动不构成间接征收；③ISDS 对气候相关措施的例外。

最后，需要确定将国际投资协定和气候变化政策进行一体化解释的方法。根据上述内容，对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之间签订的 3000 多个 BIT 和其他国际投资协定的实质投资义务进行修改，将需要一个耗费时间和资源的过程，在承认这一点的基础上，政策制定者可能希望考虑使用交叉的解释方法。即使解释本身没有约束性，但通过解释方法追求政策一体化和一致性，也可以为仲裁庭审理气候变化相关 ISDS 索赔提供“解释指南”，这是重大的一步，尤其在 ISDS 仲裁庭对国际投资协定争议条款具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情形中。《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规定的系统性一体化原则可以使 ISDS 中的环境法原则发挥作用。例如，在解释国际投资协定有关征收原则、要求国家补偿因气候变化措施而给投资者增加的成本时，采取的污染者付费原则（环境法和环境政策的一个中心原则）在要求经济主体承担内化其污染的成本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CIEL，2010）。多边宣言可以有利于加强国际投资协定与气候变化政策之间的一致性。而且通过澄清国际投资协定并不限制善意制定的气候变化措施，该文件还可以有利于保证国际投资协定框架符合多边达成一致的全球优先事项。

第四节 进一步的思考

外国投资通过提供所需要的金融和技术资源，可以在应对减缓气候变化挑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这需要更好地整合投资政策与气候变化框架、可持续发展战略。目前，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政策争论不再是有关是否采取行动，而是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背景下，争论采取多少行动、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以及由谁采取。与全球气候变化的战斗排在了全球政治议程的前列，尽管如此，政策制定者仍然试图制定与各自的国际和国内政策框架相一致的投资政策。

国际政策发展（在国际投资协定和其他国际政策行动中）主要是国家和投资者权利义务之间的重新平衡。在进一步进行投资自由化和促进投资两个政策目标之间获取适当平衡，并调整公共利益，已经成为一个关键的政策挑战。这在当今尤为困难，因为各国在处理国际投资协定体制系统性演变以及国际层面上发生的更广泛的地理变动的同时，都在努力克服对全球经济和人类发展目标产生深远影响的气候危机。政策制定者需要保证其气候危机应对措施没有对投资决定因素产生消极影响，没有增加投资关系的不确定性。这也与非核心的投资政策有关。未来的投资政策需要将有关气候变化发展问题都考虑进去，以不损害预计在气候危机后出现的外国直接投资反弹可能性。当今国际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新论坛正在国际经济决策制定过程中获得影响力，区域组织正在对其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制定进行根本变革，新兴经济体作为主要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者和对外投资者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努力防止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进一步边缘化至关重要，联合国及其全球成员国在这方面能够而且应该作出重要贡献。